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美] 马克·波斯特 著 张金鹏 译 夏凡 审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美] 马克·波斯特 著 张金鹏 译 夏凡 审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
(美)波斯特著；张金鹏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ISBN 978-7-305-15544-4

I. ①福… II. ①波… ②张… III. ①福柯, M. (1926~
1984)—社会哲学—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226 号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by
Mark Poster

Copyright © 1984 by Mark Pos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18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著 者 [美]马克·波斯特

译 者 张金鹏

审 订 夏 凡

责任编辑 李乾坤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1 字数 156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544-4

定 价 3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言与致谢

本书原为考察米歇尔·福柯论社会理论与社会史的最新著作的价值的一组论文。福柯自 1968 年以来写作的著作(《规训与惩罚》、《性史》和大量短篇)包含着某些社会理论和社会史著述中的重要进展。我的目的是从我所发现的具有较小价值的其他福柯思想的特征中析出那些进展。我并不想评价作为整体的福柯著作,而只是关注并分析它的某些特定特征。

为此,我将福柯的著作置于双重问题式中:社会批判理论的以及称之为“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的问题式。尽管福柯的政治学是模糊的,他的著作则非常适合于批判理论。我会证明,他提供了包括理论因素的分析模式,如果对这些理论因素进行适当的解释,就能为批判理论开启新方向,并将之带出它当前的困境。但只有认识到发达工业社会的某种重要变化,这些新的方向才会变得明显。为此我创造了一个多少有些瑕疵的短语“信息方式”来表征这些变化,并将当前的情势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对照。

“信息方式”这一术语指的是 20 世纪绝大部分由电子和相关技术所带来的新的语言经验。这不是一篇关于信息方式的文章,我不打算将这个术语发挥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尽管如此,我发现,只要我能说明我在福柯的著作中所发现的理论进展并将之与建立在生产方式概念基础上的传统批判理论进行对照,那么发展这一术语就是必要的。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打算提出信息方式的一般理论。

开头两章我试图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考察福柯最近的著作。其余各章考察前两章中的理论发展与《规训与惩罚》和《性史》这两个历史学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重点在于福柯的著作对于新社会史的写作的效用。

我的研究得到了学院和学会的帮助。来自于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1981—1982年的一笔奖学金在推进我工作中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我还收到来自于加州大学厄湾校区的人文学院的夏季学院奖学金，以及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批判理论重点研究项目的资助。朋友和同事们给予了批评和鼓励，尤其是乔纳森·维也纳(Jonathan Wiener)、大卫·卡罗尔(David Carroll)和弗兰克·伦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政治出版社的编辑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并提出了有帮助的建议。

有三章的较早版本发表于以下杂志：第三章在《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第49卷第1期；第二章和第五章分别在《社会人文科学》(*Humanities in Society*)第5卷第3和第4期以及第2卷第2期。它们允许这些文章的稍后版本出现在这里，我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献给我的母亲：克莱尔

阿尔伯里希
尼伯龙根的精灵们，
向阿尔伯里希致敬！
他无处不在，
将你们监视。
再也没有和平与安宁。
看不见他时，
也要为你们的主人效力，
他盯着你们，
即使你们无法将他注意。
你们永远是他的奴隶。

——瓦格纳《莱茵黄金》^①

^① 译文参照[德]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第 67 页。——译者注

目 录

- 1 / 1 福柯与萨特
- 36 / 2 生产方式,信息方式
- 58 / 3 新型历史
- 79 / 4 监狱和监视
- 100 / 5 性的真理话语
- 120 / 6 福柯与信息方式:总结性评价

- 140 / 索引
- 144 / 译后记

福柯与萨特

在英语世界里,福柯经常被认为是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人们将他的观点与德里达和拉康的那些观点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尽管有很好的理由将福柯置于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中,但是另外一种策略也是令人信服的,即把福柯描述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延续和断裂。在本书中,我所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们理解福柯当前的著作时,将福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尤其富有成效,特别是作为首要问题的政治承诺问题。可以把《规训与惩罚》和《性史》视为福柯对法国 1968 年的“五月风暴”所做的回应,这两个文本探索了一种新左派的政治立场,质疑了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对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自一战到二战以来所遭受的历史困境的理论回应,那么福柯的近作就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抗运动及随后出现的新社会构型时所遭遇到的困难而做出的理论回应。^①

梅洛-庞蒂在战后创造的术语“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是指对列宁

^①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不同的观点, 见 Russell Jacoby,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 主义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局限性所做出的反应。其源头可追溯到乔治·卢卡奇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但其主要表现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①和二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②的著作。泛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用新近的理论发展(诸如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来诘问马克思的观点,以求重新定义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他们还重新评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黑格尔主义根源^③,并且比马克思更为严格地限定了辩证法思想的形而上学范围^④,从而检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认识论难题。最终,他们将批判理论的注意力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上转移到日常生活与文化问题上。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抑或只是满腹牢骚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忠诚度要么是脆弱的,要么根本就没有。在理论上,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充其量也只是暧昧不明的。最难搞清楚的是,他们的著作究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补充,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彻底修正——仅仅坚持了政治经济批判的基本精神而已。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与阶级斗争保持系统的联系,在这一政治语境中,要阐明这些问题也就尤为困难。1968年5月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一切: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始料未及的激进运动,为新的批判理论提供了政治基础。在这一危机时刻,西方马克思主义终于可以清算他们与

①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3) and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② 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Sar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③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④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original edition 1966) and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1960).

马克思主义的债务了。

在 1968 年 5 月之前,福柯的思想轨迹一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保持距离。他抱怨他的老师们竟然没有说“法兰克福学派”^①这个词,因此使他错过了面对一种理论体系的机会,他现在认为这一理论原可以帮助他,并继续吸引着他的注意力。然而,福柯与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虽然相较于梅洛-庞蒂和萨特,福柯是年轻的一代,但他和他们一样受到了战后法国黑格尔主义复兴的影响,因为他研究了其代表人物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他还和他们一样深受德国存在主义的影响并被它所吸引。他的早期著作《精神病与心理学》(*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1954),受惠于路德维希·本茨旺格(Ludwig Binzwanger),一个深受马丁·海德格尔影响的心理学家。甚至,福柯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1961)的活力来自于对西方理性的批判,这跟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反科学主义并不完全冲突。最后,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福柯在战后岁月里活跃在法国共产党内和周围。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福柯着迷于结构主义思潮,而萨特却对结构主义深恶痛绝。

因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福柯的思想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并行不悖。他在那个时刻迅速与萨特分道扬镳,认为他自己的立场是反对所有意识哲学(包括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他这一时期的文本——《诊所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 虽然出版于 1969)、《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66)和《知识考古学》(*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写于 1968 年 5 月之前),与像萨特那种依赖于主体理论的立场明显对立。

^① Georges Raulet,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Telos*, No. 55 (Spring, 1983), p. 200 and Michel Foucault, “Afterword: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关于福柯临死之前对他自己观点的陈述。

肯定是这样。但我认为,即使是在这一极端对立的时刻,仍有可能找到福柯与萨特之间的某些类似。尽管巴黎的知识分子把萨特理解为新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反题,但萨特和结构主义者都自称是所谓“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立面。毕竟,萨特驳斥了作为现实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基础的笛卡尔主义的“理性主体”概念。虽然正如结构主义者所指责的那样,萨特依赖于一种“唯心主义的”(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如此)主体概念,但萨特思想的明确意图——尤其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却是消除笛卡尔主义“理性”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一思想倾向与福柯很接近。当然,福柯以及其他的结构主义者都否定萨特在这一点上的成就。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结构主义运动的鼎盛期之后,福柯重新思考了主体问题,认识到:尽管有重新堕入形而上学的危险,主体问题对于批判理论来说仍是无法回避的。没有某种主体(或主体们)理论,是不可能说清楚对权威的抵抗的。^①福柯所要避免的是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的主体观概念,而萨特在晚期著作中仍然保留着这种主体的痕迹。

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公然敌视一切形式的人本主义和意识哲学,这一敌意也直接指向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萨特。当福柯极力鼓吹“人死了”的时候,他无疑将萨特纳入了他所拒斥的人本主义者的行列。然而,在1968年之后,福柯对萨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恨意消融了。他开始承认其立场的重要性,在很多观察者看来,福柯比巴黎知识分子与政界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接纳了萨特的观点。

在70年代中期患病之前,萨特一直是20世纪的伏尔泰(Voltaire),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知识分子,高举正义的旗帜为被压迫者的事业冲锋陷阵,与现行体制作斗争,却又无党无派。和当年的伏尔泰一样,萨特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并因此相对不太会受到当局的打击报复(retribution)。显而易见,福柯从未获得萨特那样的显赫地位,不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p. 142, 117.

过他在 70 年代初开始支持一些反抗团体的事业,并为《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撰写了政治论文。他为监狱改革和争取同性恋者的权利而呼号;他支持反精神治疗运动和妇女运动;他分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①的重要意义。^② 这些年里,福柯也许是最杰出的、最知名的参与左派政治的知识分子。讽刺的是,福柯同时也批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

不理解福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政治立场,则他在文章和访谈中对萨特的赞誉恐怕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两人就在《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上进行了一些礼貌的交流。萨特承认福柯的《词与物》^③(*Les Mots et les choses*)的成功,但重申了他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特时说过的话:福柯回避了历史问题,即一种知识型如何被另一种知识型取代的问题。^④ 几个月前,福柯受到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某种流行精神的感染,在同一家杂志上抨击萨特和梅洛-庞蒂是“勇敢而慷慨的”的古代人。^⑤ 而 1968 年 3 月,仅仅在“5 月风暴”之前的两个月,还是在同一杂志中,福柯礼貌地打发了从黑格尔到萨特哲学中的“总体化事业”——一项已经被淘汰的事业。^⑥

福柯以其特有的谦虚继续道:“我认为萨特的巨著和政治活动定义了一个时代……我永远不会接受把我所写的历史学小册子和方法论的基础工作同这样的工作相提并论——即使为了比较也不会”。^⑦ 然而

①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统治及在国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的革命。革命发生于 1978 年,到 1979 年 2 月获得胜利。它是反对国王统治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译者注

② 这些著作的例子见“Manières de justice”, *Le Nouvel Observateur*, No. 743 (February 5, 1979); “Un plaisir si simple”, *Le Gai Pied*, No. 1 (April 1979); “Lettre ouverte à Mehdi Bazargan”, *Le Nouvel Observateur*, No. 752 (April 9, 1979); and *Inutile de se soulever?*, *Le Monde*, May 11–12, (1979).

③ 即英译《物的秩序》。

④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o. 14 (October, 1966), p. 4.

⑤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o. 5 (May 16, 1966), p. 14.

⑥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o. 46 (March 1, 1968), p. 20.

⑦ *Ibid.*, p. 21.

6 在《文学半月刊》上表现出来的这一知识分子的代沟很快就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们一起为《解放》杂志工作时得到了弥合。1968 年之后，福柯开始改变对待萨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旦福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异曲同工之处，萨特就不再仅仅是哲学上的敌人。在一次访谈中，福柯赞扬萨特在提升法国公众的理论与政治意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自战争结束以来……我们看到，有着深奥深刻的学术起源或根源的观念……已经走出了大学课堂，在广大公众中普及。现在，即使没有萨特那样名望的人继续这么做了，这一现象都已经民主化了。只有萨特——或许还要加上梅洛-庞蒂——才能做到这一点。公众的平均文化水平已经显著提高了。”^①

在这里，萨特被再次指认为福柯所认同的那种左派：“如果法国还有左派的话……我认为一种重要的因素是左派思想的存在以及起码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党外左派对左派的政治选择所做的反思……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等事件之后^②，在整个知识分子阵营内也……有了一种异常活跃的左派思想。”^③福柯在这里指的显然是萨特、弗朗西斯·让松和《现代》杂志，他们在法国共产党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况下成为反战中心。福柯现在把自己视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继承人，发展他们在共产党外部的左派批判。在谈及尼采对他自己的影响时，福柯几乎引以为荣地发现萨特对尼采也有着同样的兴趣。“你知道萨特的第一篇作品——那时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是尼采主义的

① Georges Raulet,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Telos*, No. 55 (Spring, 1983), p. 210.

②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指自 1954—1962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1954 年 11 月 1 日，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开始武装反抗法国人的统治。1962 年 3 月 18 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署了埃维昂协议，同意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1962 年 7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选民在投票中几乎一面倒地赞成独立。法国在 7 月 3 日承认阿尔及利亚为一个独立国家。——译者注

③ Georges Raulet,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Telos*, No. 55 (Spring, 1983), p. 209.

吗?《真理的历史》,一篇1925年左右发表于《学生评论》上的小论文。他讨论的是(和福柯?)一模一样的论题,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他的方法是从真理的历史转向了现象学,而他的下一代——我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①福柯把萨特和他自己都想象成尼采的孩子,区别在于萨特偏离了这一父系的传统。福柯认萨特为兄长,甚至对他们的分歧表示遗憾(“非常奇怪的是”)。1968年5月之后,福柯开始调整和重新厘清那些实质上改变了他的著作方向观念。我关心的不是福柯思想的连续性或不一致性问题,而是他在1968年之后的著作中的理论方向。我认为福柯在这一时期开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短兵相接,而他所采取的立场(在某些情形下类似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总体上超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向批判理论的新构想。简言之,福柯既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又将之导向一个新的高度。

7

1968年5月之后

1968年“5月风暴”表明,反抗现存社会的立场有可能逾越当代马克思主义所定位的边界。五月期间,新团体加入了抗议运动,这些与无产阶级没有传统上的联系。事件是由学生们发动的,继之以专业技术人员,并得到了年轻的产业工人的支持——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中坚。这些团体依靠新的行动方式,比如他们的挑衅策略只是用来揭露现存秩序的弱点,而不是要推翻当局、夺取政权等。他们发展出了新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行动委员会,它是完全民主的,意在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而非动员暴动的力量。最后,他们在墙报上要求构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这些墙报中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反对资本主

8

^① Georges Raulet,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Telos*, No. 55 (Spring, 1983), p. 204.